



# 故事与故事精神

——李梅文学批评

李梅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故事与故事精神

——李梅文学批评

李梅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故事与故事精神 : 李梅文学批评 / 李梅著 .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5.7

ISBN 978-7-5100-9911-3

I . ①故… II . ①李… III . ①报告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 ① I2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8952 号

## 故事与故事精神——李梅文学批评

---

策划编辑 赵 泓

责任编辑 汪再祥

封面设计 梁嘉欣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5100-9911-3/I-0365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 文学：一个可安放我不安灵魂的所在

一本书要出版，大概都需要一个序，这个序大概也都被期望由某名人来写以示要紧。作为此书作者的我也一样。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本关于当代作家的文本批评，就更期待能得到某名家的青睐。但没想到，我为此愿先后诚请的两位名人皆婉拒了我。面对第一位名人精心打造的自谦，我除了如同10多年前一样在睥睨中理解、在理解后睥睨，此刻已不愿多语一字。而第二位名家则是真诚地认为自己为此书作序有“跨界”之嫌。

有“跨界”就得先有“界”。“界”和所谓“圈子”、“坛”等在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世界，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所谓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水平、声名及利益，都和你是否属于某个圈、界，是否在某个圈、界里混得江湖地位有很大关系。学术的各种圈、界、坛其实也就是中国的学术托拉斯。因此，能否进入各种圈、界、坛，也是诸多学子、学者们孜孜以求的事业目标。尽管人们对此早有微词，诸如“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但坛依然是坛，圈子也依旧是圈子。

学了文学，毕业后又长期从业传媒，之后又致力新闻传播之高等教育，

我曾时常问自己应该朝哪个圈、界、坛努力，但至今迷糊，没有答案，于是也就索性不绞尽脑汁去追求靠近或进入哪个圈、界、坛了。萨特搞哲学研究，他一边思考存在的问题一边上街游行反战或闹革命，他应该是属于啥圈子？萨义德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参与中东政治问题的研究或实践活动，同时终生以音乐为伴，研究贝多芬，写有《论晚期风格》如此优秀的关于艺术家的论著，那么他应该属啥界的，政治家、社会学学者还是艺术家？福柯研究后现代哲学，同时由于其家族的医学背景，他又研究疾病对人的影响，研究疾病尤其是精神病、性关系以及同性恋在现代世界的发生及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影响。有时，我还真怀疑法国人是否搞错了，这位被他们尊为“当代最伟大哲学家”的人是不是应该属于医学界？

有了这些胡思乱想，我为自己消极于圈、界、坛的追求似乎找到了逻辑支撑。我从大学本科到博士的全部学历教育都是文学。我之所以一直坚持读文学并不是中途没有一些潮流的或有钱途的专业选择，仅仅是因为我爱文学。我对于文学的敏感和喜欢，并没有传说中常见的什么“诗书传家”、“家学渊源”或是什么自幼熟读《红楼梦》之类。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母亲读过刚解放时新中国政府为农村青年开班的“冬学”，也就是趁冬天农闲季节给农村青年进行文化扫盲。记得父亲曾不以为然地说：念了几天书也就是认得自己的名字！而母亲则大声反驳：我认得报纸上很多字！父亲之所以对母亲读过几天的“冬学”很不以为然，因为他是正儿八经读过小学的。对此，母亲亦有说法。她说：看着是和人家娃一样，背着书包在该上学的时间去上学，在该放学的时间回来了，实际上连老师的面都没见。为啥呢？根本就进学校门，去城外地里挖蔓菁去了么！对此，父亲总是笑而不语，半晌后才说：饿得没办法。

虽然饥饿和贫穷使得父亲没有机会接受更高一点的教育从而成为他所说的“国家干部”，但父亲写得一手极其漂亮的钢笔字，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噼里啪啦，看得周围人眼花缭乱。他一生与土地为伴，在最艰难的年代为家庭、为儿女历尽一个父亲能承受的所有艰辛。其实就个人能力和人格品质，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他不够做一名国家干部。他不懂什么文学武学，但父亲有他自己对于文化人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字必须写得好。每每我们谈及故乡有出息

的文化人，只有听到那些字写得好的，父亲才会出声：嗨！那人写得一手好字！这可能就是父亲对于“文”的唯一关系了。

我对于文学作为一种艺术之魅力的敏感或觉醒完全来自于语文课堂。16、7岁的年纪，正在乾县一中读高中。文理分科之后，我们文科重点班教室走进一位名叫何亚阁的中年男老师。何老师方脸大嘴，戴黄塑料框（后来大概换成金丝边了）的深度近视镜。进教室的时候有同学悄声说：“这是语文王。”“语文王”何老师讲课的时候用普通话，骂懒惰学生的时候用我们陕西乾县话。无论是讲课还是骂人，何老师都能做到唾沫星子飞溅，甚是过瘾。记得讲到《鸿门宴》里“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何老师边读、边讲、边动作，他丰富的唾沫星子也就随之改变了以往比较固定的方向，几乎360度地挥洒，这就让平时因为座位角度不佳分享不到唾沫星子的同学，也额外得到这知识之雨露甘霖的滋润，从而也就对这堂课的印象极为深刻。何老师不单是课文讲得好，他还有个教学爱好，正是他这可爱又堪称伟大的教学爱好，培养了我此生与文学的不舍之恋。

我想，肯定是因为他自己喜欢看小说，何老师动不动在下午的时间给我们读小说。之所以说是“可爱”，试问，现在有没有这样和学生一起，而且是老师给学生读小说，然后一起赏析，讲解其中故事的老师？没有吧！之所以说是“伟大”，现在全中国的高中生，大概从小升初开始，校内校外的时间大概都被无穷的模拟试题所占据吧？想想安徽毛坦厂中学墙上挂的标语：今日疯狂，明日辉煌，难道你不觉得，在高考把中国中学生全部压迫进地狱般、魔鬼式试题训练的青春时间段，能有一个老师引导你，徜徉于种种人世故事，让本应如春天燕子一样轻舞飞扬的青春心灵得到片刻自由，该是多么奇迹事情？1984年的高考已经是我国高考制度经过几年恢复，越来越正规化的时段。那时招生人数远远少于现在，高考是真正的独木桥，而且社会的开放程度也远远低于现在。也就是说，高考能否成功，那才真正是能否改变一个农村孩子命运的唯一时刻。但就在这样的高考面前，何老师照样在一周内的一两个下午给我们读小说。读到写得好、他喜欢的段落，照样唾沫星子全方位飞溅。但最后的高考事实是，我们全班都考上大学，近半进了全国重点大学，最差

的就是一两个大专。就我而言，则是语文、历史及英语单科分数超高。有时想，现在的中国教育，高等院校集体升格，扩招后扩建，扩建后又扩招，大学真是越搞越大。而且整个社会，包括互联网的发展也为年轻人提供更多自我发展的机遇。按理，学生应该拥有一个身心相对自由的青春时代。可是，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类似安徽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中学这样，在西方教育家及媒介看来，如同噩梦或地狱般的中学？造就了专门制造考试机器的高考工厂？是失之偏颇的教育理念还是中国家长根深蒂固的争做人上人的等级攀比观念？总之，如果现在某中学有个语文老师，胆敢和面临高考的学生一起读小说，不要说学校如何处理他，单是学生家长，恐怕都要把这老师用食指戳死。从这个意义上，把“伟大”一词送给我高中的何老师不过分吧？

80年代初期，用洪子诚先生的说法，那是一个中国文学从长期的文革模式中刚刚“解冻”的时期，出现了一批“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的作品。正是在这一周内的一两个和何老师一起的下午时光里，我知道了“当代文学”这个理论概念，知道了《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小说选刊》等这些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之一，知道了刘心武、卢新华、王蒙、孔捷生等最初的一批作家，知道了伤痕、反思、寻根是什么意思，也是第一次觉得文学的世界离我的生活是如此接近。记得听到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里写的那个知情，在晚上的河边和那个叫穆兰的姑娘偶遇的场面，我激动地爬在桌上不能动，觉得何老师的唾沫星子都定格在空中一样。而在这之前，我记忆中唯一读过的小说是一本名叫《新来的小石柱》的书。关于这本出版于1975年的、我十六、七岁之前读过的唯一小说，我写这个序的时候才专门在网上查阅了有关资料，得知作者名叫黄家佐。现在的网络是这样介绍此书的：

“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75年被改编成连环画，同时，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也都在播讲这部长篇小说……1974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那是一个8亿人口只有8个样板戏看的荒唐年代。文化沙漠中，一个青年作者写的一本小说——《新来的小石柱》成为当时缺乏精神食粮的中国青少年爱不释手的儿童文学作品。‘小石柱’也成为他们心中的偶像和朋友。”

估计现在的80后90后对这段介绍不会感兴趣，那么网上还有一段话：

“贯穿文革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教条的儿童小说《新来的小石柱》，197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又改编为连环画。里面的主人公小名叫石柱，大名“石成钢”。该书作者黄家佐（笔名“童边”）的儿子在1977年出生，姓氏随其母亲芮淑敏，取名‘芮成钢’……1977年，《新来的小石柱》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摄制成为66分钟的大型动画片《小石柱》，在全国公映。”

对了，作为我小少女时代唯一精神食粮的儿童小说《新来的小石柱》，就是那个曾动不动就说“我的朋友奥巴马”的芮成钢他爸年轻时写的。

等到琼瑶的《窗外》《在水一方》等言情小说占据80年代中后期大陆少女枕边读物的时候，我已经渐渐历练为具有批评眼光的专业读者而根本不屑于琼瑶阿姨的迷魂汤了。1984年的9月，我踏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我原以为，这和自己最初填报的大学并不符合会令我无比失落。谁知一进到学校，内心竟然有一种莫名的归属和安适的感觉。永远记得第一次到图书馆晚自习的情景：我刚坐下打开书一会儿，这时就有一个头发竖着的高年级男生走过来，他大方地看着我，甚至有些理直气壮地说：你是新来的吧？我瞪着眼睛不知如何反应，再瞪大点眼睛表示yes。然后，“啪”，他把一叠手稿甩在我面前，说：“替我把这稿子誊写一遍，这是我刚刚完成的一个中篇。”啊！原来他是作家呀！原来作家就是这般模样的呀！我的激动难以表述。当我赶紧接过那叠手稿的时候，我觉得我离文学竟然是如此接近，近到甚至可以触摸了！

80年代中期文学的变化被批评家认为是文学的“转折”。对“文革”和当代历史的书写仍为许多作家所直接或间接关注，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已经出现。在我所在的陕师大中文系，近半男生有诗人、作家的梦想，我们创作、传阅，然后争吵又和好。我们每周结伴去书店，用省吃俭用的钱奢侈地购买最新的西方文论译著，黑格尔、康德、尼采、萨特、博尔赫斯、伊格尔顿、卡希尔、房龙等等，并每天把这些遥远又闪光的名字，如同老人念叨几辈子的邻居一样整日挂在嘴边。我们



用囫囵吞枣来的理论讨论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以及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等。我们不单是思考文学、讨论文学，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里那一群看似荒诞怪异的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无不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实际生活。比如我宿舍就有个整日蓬头垢面爬在桌子上写小说的女同学，在某个晚上一个人躲在帐子里一口气把一罐麦乳精干挖着吃空。她写作的时候还有个习惯，就是不停地用左手指搅缠左额头的那片刘海，不停，尤其写得不顺的时候，搅、揪、绞。一学期下来，她的作品俺们都没咋见过，只见她额头已经没啥刘海，都快秃得发亮了……我们这个同学简直就是刘索拉笔下的人物。而刘索拉小说里那个一天擦几十遍地板的小个子，那个永远身边带着一把铮亮的剪刀，遇到不高兴的事见啥就开剪的女作家，也就正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

如此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感到自己生活得是如此文学。我们成群结队，有人身背吉他，有人手提啤酒，晃荡在午夜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有人喊：月光，另一个就接着喊：姑娘；一个喊：世界，我来了！另一个则叫嚣：世界，你在阿达（西安方言，哪里）……然后，是谁，“啪”地一声，把啤酒瓶又高且远地甩出去。片刻寂静，过后就有人开始唱：深深的海洋……嗨，一个女文青的80年代啊！

陕师大中文系的4年，除了所谓夹杂着所有青春思考及荒诞的文学活动，真正造就我的，应该是被我称之为“师大之魂”的图书馆。陕师大图书馆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优秀作品，典雅庄重、气势宏伟。无数个白天或夜晚，那些深色的联排木桌椅，石青光洁的地板，丝丝作响的白炽灯光，是母校留给我记忆中永远的青春怀恋。此次回来听说师大大搞装修，为了防风吹雨淋，他们把图书馆原来大红的椽檩木窗和青瓦都换成同色调铝合金的了，心里突起一阵隐约疼痛。是的，我的心确实感到了疼痛。因为似乎只有那镶满巨大木质红窗的青砖墙，才是我能触摸到的有质感的精神基石。她那因阳光和风霜而褪色的木质，是坚密而温暖的；那一块块错开而连接的

大青砖，粗粝却平整。我甚至觉得原来质地的图书馆是一座会呼吸的建筑，她如同学子的灵魂，应该是自然之神的造物。而铝合金，和日月风霜是如此隔异，要么滚烫要么冰凉，而且永不掉色，除了光滑还是光滑，这难道就是现代人或现代大学所要追求的吗？

在那青砖红窗、会呼吸的巨大建筑中，我每每缩在一个固定的角落位置，如饥似渴地读小说，借了还，还了借，抄抄写写做笔记，往往因到了闭馆时间被管理员赶出二楼自习室为止。等回到宿舍，要么是因没赶到饭点胡乱吃点，要么就是没有灌上暖水壶，那可是在北方冬天没有暖气的学生宿舍里我们唯一的温暖来源。但盘旋在头脑里的那些故事和人物，足以让我忽视床铺的冰冷。他们在我眼前微笑、哭泣、愤怒或诉说，他们和我一起度过一个又一个学生宿舍空气冰冷却内心滚烫的夜晚。这4年，我所读过的外国小说从俄罗斯到欧美，远远超过现在一个外国文学教授给他的研究生开列的50-80本书单，中国古典小说包括《红楼梦》和《金瓶梅》的第一次阅读也是在这里开始。而且由此形成的阅读习惯已成为我生命惯性的一部分，至今无法改变，几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几十年过去，祖国南北，太平洋两岸，在我所有人生奔波的时空变化中，4年师大图书馆时期留下的近10本读书笔记，始终不舍丢弃。有的甚至仅仅是对书中某个段落的摘抄，但无论什么时候，每当我翻开，每当我看到笔记本的款式、纸质，那特殊的气味以及20岁时的笔迹，当时摘抄这个段落时的阅读喜悦，也就是纳博科夫说的，真正的艺术给人们带来的“审美狂喜”，就会悠然掠过我的心头。沧桑人世，大多数事情我们都只愿意经历仅仅一次就足够，这种能反复、一再给人带来喜悦的美好人或事能有多少呢？

师大中文系的4年奠定了我阅读和知识结构的塔底，这个精神之塔由下到上应该是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包括传记和非虚构作品），西方及俄罗斯哲学及文论，新闻与传播学理论，此外就是大量随机阅读的社会学及历史学杂书等。大概从暨南大学跟随饶先生读博开始，我彻底从一个文学的专业读者变成批评者。也许因为看过太多的作品，也许因为成为文学博士，总之这时就陡然觉得自己有了对作品指手画脚的底气。写作文学批评的最初几年，我一边忙于报纸的采编出版，一边开车去暨大上课、见导师。巨大的工作量及学业，我家里家

外满负荷运转。因为有些学分课是晚上上课，再加上采访活动，我那几年几乎是不分昼夜地在 105 国道广佛路段奔波。这些迎面而来、而我却乐在其中的生活重负，练就了我的好身体、好车技。我不是超人，我想我之所以能举重若轻地负重这一切，多半是因为能再次和我爱的文学不再远离。似乎只有文学世界，能让我在现实世界的浮躁势利、杂乱荒诞以及无限的无奈面前，有一个抚慰和安放心灵的所在。而且，至今，我仍然坚持文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人生的最佳路径之一。仅仅学会了投资、理财、股票或养生确实是幸福人生的保障，但艺术及审美的快乐带给人们的心满意足和心灵升华，是没有物质可以代替的。

作为文学这门艺术最重要形式之一的小说无非是讲故事。所谓故事最基本的因素一定是谁、什么时间、在哪儿、做什么。从这个叙事元素的角度看，小说和新闻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新闻叙事必须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西方新闻界尤其推崇新闻的绝对真实，稍有臆想都是违背原则。而小说是完全出于作家的想象。举个例子：

“他的帽子像是一盘大杂烩，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的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面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 3 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有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着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着一个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

帽子是新的，帽檐还闪光呢。”

这是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开头一段，对包法利先生少年时代上学进教室时所戴帽子的描写。但纵然你见多识广，你见过或你能想象这是一顶怎样的帽子吗？不能吧？不能。因为这个要讲故事的福楼拜，打算连同他的包法利夫人都是想象的，帽子肯定是你没见过的，但它确实是包法利先生少年时戴过的帽子哦。而且一旦读者看完小说，你就会觉得可怜的包法利先生似乎就应该戴这样面目模糊的帽子。这就是小说作为想象叙事的魅力所在。

叙事 (Narrative) 也就是讲故事。叙事在人类的经验和存在中无处不在，正如故事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和功能。美国神学家斯坦尼·哈弗罗斯认为，生

活中的叙事才是德性、伦理建设的基本途径。他引用另一位神学家米科的话说：“使一个故事得以进行并让我们追随的特征是一些线索，历史理解的本质的线索。一种历史性的叙事并不表明事件的必然性，而是通过展示使得其意义相关的故事，让这些事件变得可以理解。”这就是说叙事和故事都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使其“意义相关”。所以，但凡有优秀的故事必定有一个使“意义相关”的“精神”或者成就故事精神的“德性”。

小说家首先要会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但仅仅会讲故事的作者是称不上“伟大”的。这本文学批评论文集正是以“故事精神”为关键词，从如何让叙事成为有“德性”的角度，对张爱玲、白先勇、严歌苓、施淑清、王安忆、苏童及王蒙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专题论述或文本批评。因为这些作家的共同特点是以会讲故事为长，包括诗人于坚，也是以日常化的诗歌意象、诗歌语言为长，尤其长于日常叙事，所以，了解本书的另外一些关键词也许应该还有叙事、日常叙事、身体叙事、现代性等。伟大的维根斯坦说：“在艺术中很难做到的是：有所言说，又等于什么都不说。”我想说的是，这里的“有所言说”就是谁、什么时间、在哪儿、做什么这些故事的基本元素。而所谓“什么都不说”就是我所说的、你所体会到的“故事精神”。它如同那些在深秋的早晨，凝结于沉甸甸果实上的薄霜，如同宝石那可见却不可触摸到的光芒，如同足以让你忽略或素或艳外表的花朵的香气，如同灰烬上空萦绕盘旋的热，从不具象，却永留你心。

看着利来利往的熙攘天下，也许有人会觉得沉迷艺术和文学是奢侈或矫情的。我从不这样认为。博尔赫斯曾说他所想象的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对我而言，我想我的天堂是这样的：一个漫长到无限的下午，窗外或雨或晴都无关紧要，只要室内有手可及的我的几架几千册书，一个最好像芝华士那种可打开放脚的软皮沙发，边上有足够光亮的落地灯，然后呢，一杯不加糖的柠檬红茶，几片抹了黄油烤过又凉了的面包……我和我的书就这样随着黄昏的到来、黑夜的到来沉下去、沉下去。为什么不去社交呢，喝茶、吃饭、聚会，各种眉来眼去的周旋，或者为什么不去旅游呢，购物、炫富、异国风光发微信，我真是想，如果可以，任天地混沌都可与我无关更何况这些。

一个人住在瓦尔登湖畔的梭罗认为寂寞是有益于人身体健康的。他写到：

“人们常常对我说，‘我想你在那儿住着，一定很寂寞，总是想要跟人们接近一下吧，特别在下雨下雪的日子和夜晚。’我喉咙痒痒的直想这样回答，——我们居住的整个地球，在宇宙之中不过是一个小点。那边一颗星星，我们的天文仪器还无法测量出它有多么大呢，你想想它上面的两个相距最远的居民又能有多远的距离呢？我怎会觉得寂寞？我们的地球难道不在银河之中？在我看来，你提出的似乎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怎样一种空间才能把人和人群隔开而使人感到寂寞呢？我已经发现了，无论两条腿怎样努力也不能使两颗心灵更接近。”

微信可以让你和朋友天涯若比邻，但我从不认为它能使两颗心灵更接近。而有了文学艺术，我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欢喜若狂。而且，我明明看到：虚荣却幼稚的包法利夫人为还高利贷，奔走于几个旧情人之间来回借钱却根本借不到；我还看到安娜卧轨的时候，托尔斯泰让其出现3次的安娜手挽的那个小皮包，真想问问老托尔斯泰安娜的包包到底是红色的还是碎花的，因为诸多汉译本说法不一。我想给安娜说，她是对的，她不是用死威胁他，因为她爱他。她也不是威胁自己，而是威胁那个迫使她受苦的人。其实那个让她受苦的，也不是什么具体的人，而是她心中永远炽烈的爱情。我还看到天生就具有完美女主人气质的达洛维夫人，如何在一个衣着光鲜、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夜晚站在窗边，突然之间看到自己人生的空虚和虚伪……这无数的人物在我眼前走动，他们如同大学时代那些从图书馆晚归的夜晚一样，在我眼前微笑、哭泣、愤怒或诉说，使我的房间热闹甚至拥挤不堪，我忙于照顾和安慰他们都来不及，怎么会有寂寞之感呢？

是为序。

2015年8月初 暑期于西安·曲江

## 目录

- 自序 文学：一个可安放我不安灵魂的所在 / 1
- 张爱玲的小说传统与文学中的日常叙事 / 1
- 张爱玲与无产阶级文学 / 13
- 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 / 28
- 论“身体叙事”的文学含义
- 故事与故事精神 / 39
- 海外华文文学三小说论
- 因过分“世俗性”而损伤了“英雄气”的小人物 / 49
- 评王安忆的《长恨歌》
- 铿锵悲凉的末代挽歌 / 58
- 论白先勇《台北人》
- 细节的热情 / 69
- 苏童《红粉》及其它
- 被男权话语误读了的两性世界 / 74
- 评阎真新作《因为女人》

记忆是心灵的真相 / 80

——王蒙《青狐》的一种解读方法

没有欺骗的写作和生活 / 88

——《王蒙自传》读后

“狼獾小说”的现代性魅影 / 96

挖掘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和谐因素 / 105

——对近年来少数民族长篇小说的文化生态学分析

“审美狂乐”之《洛丽塔》及“萝莉” / 114

报告文学：“他者”的文学新闻 / 124

作为文学新闻的“我们的”报告文学 / 142

——中美文学新闻之叙事比较研究

于坚：一个诗人的民间立场 / 152

文学·爱情·女性美 / 174

——和饶芃子先生的对话

## 张爱玲的小说传统与文学中的日常叙事

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诞生了许多重要而复杂的作家。有些作家，似乎专门为文学史而存在；而有些作家，他们自身的存在，就足以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史——张爱玲就是其中的一个。

### 接受史

按照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的论定，“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sup>(1)</sup>，但这样一位重要作家在中国却被遗忘却在中国被遗忘了许多年。其中原因，牵涉到张爱玲所走过的生命历程，也关系到张爱玲作品在国内的接受史和传播史。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1 年版，刘绍铭等译，第 335 页。



有研究者说，1944和1945年的上海，可说是张爱玲的上海。1944年9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杂志》出版，4天后再版。1944年底到1945年初，改编成舞台剧的《倾城之恋》在上海卡尔登大剧院隆重上演，演出场场爆满。1944年5月1日，著名学者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在《万象》杂志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sup>①</sup>。文中激赏张爱玲的小说是“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论文还总结性地发现了张爱玲小说一个鲜明的美学风格，那就是“新旧文字的揉合，新旧意境的交错”。但随着抗战结束和解放战争的开始，如昙花一现的张爱玲陡然失色，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张爱玲以继续学业的名义离沪赴港，后赴美国。从此，上世纪40年代这个在上世纪40年代上海文坛如星光般灿烂的女作家，在中国大陆读者的阅读视野和文学史里陡然消失了。

与此消失相对立的则是台港文艺界对张爱玲的认可与肯定。张爱玲在创作领域得到偶像般的推崇。1957年，台湾学者夏志安在台北《文学杂志》刊发了其弟夏志清的《张爱玲论》，该文是继上世纪40年代傅雷和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评论之后，再次从专业阅读的角度肯定了张爱玲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该论文为基础，专章论述了张爱玲的创作。该书不仅充分肯定了张爱玲的文学成就，还对沈从文、吴组缃、钱钟书、师陀等一批长期被国内学界忽略、被国内多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所尘封的现代作家们，给予了高度肯定。

此后，在台港两地，尤其是台湾，对张爱玲的学术研究从未中断。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向。首先，夏志清采取中西比较的方法，给张爱玲以正面的评价。其次，是以台湾旅美学学者李欧梵和王德威为代表。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从西方现代性的角度去考察中国现代文学，通过分析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种种不同表现，从而归纳出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日常生活的叙事美学。本文的一些论述也正是沿着李、王二人这个思路的“再言说”。第三个方向是台港学者如水晶、陈炳良及后来的周芬伶、苏伟贞等人采取的细读文本的方法，对张爱玲作品

(1) 该文见钱理群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1937-194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49页。